

《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

庄 丹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这一全盛期的结束当以《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完成为标志。通过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左传》及其评点的立场和评价,不仅可以认识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价值。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左传》;文学;评点

中图分类号: I 1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6-0061-06

A Bibliography of Si Ku Quan Shu and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Zuo Zhuan in Early Qing Dynasty

ZHUANG Da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Zuo Zhuan* (the commentary of Zuo) in early Qing dynasty is in the history of its heyday, the end of which is marked with the compiled *A Bibliography of Si Ku Quan Shu*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its comments and appreciation on *Zuo Zhuan*, the paper discusses historical reasons leading to the decline of literary criticism of *Zuo Zhuan* in early Qing dynasty, which helps to further study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special value of *A Bibliography of Si Ku Quan Shu* i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Zuo Zhuan* in early Qing.

Key words: *A bibliography of Si Ku Quan Shu*; *Zuo Zhuan*; literary; criticism

李卫军《〈左传〉评点研究》认为综观《左传》评点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明万历以前,是形成期;明万历至明末,为发展期;明末至清乾隆时期,为全盛期;清嘉庆至民国初年,可称《左传》评点的延续与余辉期”^{[1]12}。清前期的《左传》评点学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具有广泛影响及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左传》评

点作品基本上出现于此一时期。在古文选本方面,影响较大者,有金圣叹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孙琮《山晓阁古文选》、储欣之的古文选本,过珙的《古文觉斯》,林云铭《古文析义》,徐乾学奉敕所选《古文渊鉴》,吴楚材、吴调侯所选《古文观止》,谢有辉《古文赏音》,浦起龙《古文眉诠》,于光华《古文分编集评》等。《左传》专书评点,有王源

收稿日期:2013-09-27

作者简介:庄 丹(1985-),男,福建莆田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文章练要左传评》,刘献廷《左传快评》,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冯李骅《左绣》,魏禧《左传经世钞》,周大璋《左传翼》,姜炳璋《读左补义》,卢元昌《左传分国集评》,李绍崧《左传快读》,盛谟《于野左氏录》等^{[1]27}。值得注意的是,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至乾隆时期峰回路转,由全盛期转为衰落期,其历史转变过程恰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过程相一致。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目录学著作,实际上也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2]75},《四库全书总目》的完成实际上标志着乾隆时期文学批评主流精神的转变,同时也是清前期《左传》评点这一文学批评思潮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四库全书总目》“不仅代表个别人或部分人的观念,而且代表以乾隆为首的整个统治阶级集体的思想,代表封建社会正统、正宗的学术观念”^{[3]132}。本文即从《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由盛而衰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探析,说明《四库全书总目》之编纂实可视为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全盛期终结的标志。

一、《四库全书总目》对《春秋》及《左传》的接受

《四库全书总目》共二百卷,其将《四库全书》“著录书”、“存目书”逐一撰写提要,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汇编成初稿。后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正式定稿,同年由武英殿刻版;1795浙江地方官根据武英殿版翻刻,并得以广泛流传。《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实际上是康熙至乾隆朝文化政策不断发展的结果,其对清前期《春秋》经以及《左传》的接受尤其值得研究。

清王朝以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巩固统治政权的一个首要问题即是如何阐释“夷夏之防”,这样《春秋》这一最具“夷夏之辨”的经书就首当其冲。“《春秋传说汇纂》始于康熙三十八年,而《周易折中》始于五十四年,《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始于六十年,且《日讲春秋解义》还在这之前,由此可见康熙时对《春秋》之重视”^{[4]431}。戴维先生在其《春秋学史》中不仅指出清朝自康熙帝起就对《春秋》特别重视,而且认

为:“其原因大概是一者以为《春秋》乃天子之事,有关治道最巨,二者以为《春秋》中有所谓夷夏之辨,有关时势最切,亟需解决,故重视之而先于他经”^{[4]432}。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最先钦定编纂的《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成书之后,直到康熙死后的雍正七年才重加校订,后再直到乾隆二年才刻板刊行。《日讲春秋解义》一书是以胡传为基础的,康熙在其卷首称:“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谷》,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挟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5]卷首}。可见早期的康熙还是推崇胡安国传的,认为“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并没有深刻意识到《日讲春秋解义》中产生于南宋的胡安国传之“尊王虏夷”的根本思想。但到其编《春秋传说汇纂》时,康熙对《胡传》的态度已有截然的变化:“迨宋胡安国进《春秋解义》,明代立于学官,用以贡举取士,于是四传并行。宗其说者,率多穿凿附会,去经义逾远。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6]卷首}。康熙《春秋》学思想的变化不仅展现清朝统治者对《胡传》否定的历史过程,而且深刻说明《春秋》经在其统一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

随着清朝统治者对最具“夷夏之防”的《春秋》一经重视程度的加强,《春秋》三传的《左传》更是逐渐取代《胡传》而被定为首要的传本。从《春秋传说汇纂》看,其集《春秋》三传以来134种传注,可谓集《春秋》传说之最,“今观《汇纂》解经体例,首列《左传》、次列《公羊》、《谷梁》”^{[7]23},各家传说排列顺序及取舍鲜明体现出清朝统治者的义理倾向及价值取向。康熙帝于《春秋》各传中则特别偏好《左传》,尤其喜欢研究其中蕴含的帝王之道与君臣之道。康熙二十四年,康熙敕徐乾学编注并评点包括《左传》八十一篇在内的上古三代历史散文,成《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其不仅时常与《左传》名家高士奇等一起研读《左传》,而且在《古文渊鉴》中谓:“文、武之教之入人最深,自《诗》、《书》所载以外,惟《左氏》为备”^{[8]卷四}。综观《古文渊鉴》一书,康熙帝不仅选

文以《左传》为首,且对许多篇目亲自评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示范意义,从而极大的刺激了《左传》等古文评点的繁荣”^{[1]40}。

不仅康熙帝重视《春秋》学思想及《左传》之地位,其后的雍正、乾隆也一直延续对《春秋》及《左传》的重视。特别是乾隆时期“成书于乾隆十年的郅坦《春秋集古传注》所采古注,除杜注、孔疏之外,以啖助、赵匡以下宋代十七家传说为主,辅以宋元其他传说,用征引的多少表示重要性的等级,其经文、叙事都据《左传》”^{[9]132}。乾隆二十三年(1758)编《春秋直解》,乾隆在序中揭露胡传的“附会臆断往往不免”^{[10]卷首}。且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政府在科举考试中更是彻底废除胡传:“礼部尚书纪昀等奏,向来考试,《春秋》用胡安国传,胡传中有经无传者多,出题处甚少。且安国当宋南渡时,不附和议,借经立说,原与本义无当。圣祖仁皇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驳胡传者甚多,皇上御制文亦多驳其说。科场试题不应仍复遵用,请嗣后《春秋》题,俱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穀梁》”^{[11]566-567}。

客观地说,《春秋》及《左传》在清前期康熙乃至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时备受重视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与历代《左传》被立为官学不同的是,《左传》在清初的实学思潮中,为封建帝王扮演了相当重要的政治借鉴作用”^{[12]47}。在此政治思想指导下,《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总序称:“《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13]210}故《四库全书总目》对《春秋》及《左传》“取之不敢不慎也”,其文学评点也必然成为统治者取舍的重要内容。

二、《四库全书总目》与“评点”文学批评样式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能在康熙至乾隆时期蔚为大观,与“评点”这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批评样式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批评样式可谓源远流长,从有意识的、成系统的以诗序为主的汉代文学批评样式开始,经以“大

一统”的专著专论式为主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样式、以诗格为主的唐代文学批评样式、以诗话为主的宋代文学批评样式,终于发展到以评点为主的明清一代的文学批评样式。“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与‘话’、‘品’等一起共同构成古代文学批评的形式体系。这种批评形式有其独特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批评文字与所评作品融为一体,故只有与作品连为一体的批评才称之为评点,其形式包括序跋、读法、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和圈点”^{[14]6}。无论是诗序、专著、诗格,还是发展到了宋代的诗话,其文学批评样式的自由度客观来说都要低于评点。就拿诗话与评点来比较,应该说诗话已经是一种体制较灵活、自由度较高的文学批评样式,其由一条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不是逻辑严密、结构严谨的崇论闳议,而是亲切随意的漫谈随笔,语气轻松,文笔平易,顺手拈来,信笔写去,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相对评点来说,诗话的自由度还是稍逊一筹。评点除拥有诗话的优点外,其体式更是不拘一格,生动活泼,优游自在,长可达千言,短则一字一句。而且评点还有各种各样可最大限度满足读者阅读评价需要的样式。就“评”而言,就有文前评、文后评、字评、句评、段评、节评、篇评、总评、眉批、夹批、旁批等;就“点”而言,又有单点、连点、单圈、双圈、连圈、双杠等。

“评点文学是一种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双重属性的特殊文学形态”^{[15]1-2},通过评点这一特殊的文学批评样式,广大文人士子可以在最大程度提高《左传》文本作品研读的同时,通过最有效的文学批评样式以学习各种文法。“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人讨论文学作品时的一种方法,从宋朝晚期逐渐定型,经过明朝几位批评大将的推行,至清即成为普遍的讨论文学的方法”^{[16]74}。“评点”批评样式在清前期《左传》文学接受上历史性地“成为普遍的讨论文学的方法”,然而其自明中后期蔚为大观实是与阳明心学内在联系在一起。阳明心学“个个人心有仲尼”的个体意识以及在此哲学基础上不断繁荣发展的散文、小说、戏曲等评点,与康熙至乾隆时期致力于“确立

一种主流的正宗的思想意识”以维护清王朝统治在根本上是相违背的。“评点”这种体制较灵活、自由度最高的文学批评样式也正成为反抗清政府统治的文人士子们手中“笔”的武器,成为一种让清朝政府在统一意识形态上最为头疼的批评样式。自康熙到乾隆朝,文字狱愈演愈烈,著名的文字狱大案如庄廷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频频令世人震惊和畏惧,其中吕留良案^①即直接因“夷夏之防”论而起。特别是“乾隆三十八年修《四库全书》时,对春秋类著作进行大规模的查禁销毁、改词易字”^{[12]44},深刻说明乾隆时期对春秋类评点著作的整体否定^②。如代表《左传》评点学最高成就的《左绣》,《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是:“是篇首载《读左卮言》、《十二公时事图说》、《春秋三变说》、《列国盛衰说》、《周十四王说》。书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预《经传集解》及林尧叟《左传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则时多删节。又摘取孔氏《正义》及国朝顾炎武《左传补正》二书与杜氏有异同者,附於其后。别无新义。上格皆载李骅与浩评语,则竟以时文之法商榷经传矣”^{[13]258}。四库馆臣坚持《左传》研究当以经义为对象,极力排斥用文学评点之法看待《左传》。又如对王源《或庵评春秋三传》的评价:“经义、文章虽非两事,三《传》要以《经》义传,不仅以文章传也。置《经》义而论文章,未矣。以文章之法点论而去取之,抑又未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录《左传》,古无是例,源乃复沿其波乎?据其全书之例,当归《总集》。以其仅成三《传》,难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类焉”^{[13]256-257}。“置《经》义而论文章,未矣。以文章

之法点论而去取之,抑又未矣。”《四库全书总目》对《左传》评点学之立场可见一斑。

吴承学《〈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指出四库馆臣对“评点”采取一种暧昧的态度,且在整体上是趋向于一种贬斥的态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哪一种批评形式本身像评点之学这样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议”^{[17]5}。“四库全书的编纂正值乾隆盛世,目的是要确立一种主流的正宗的思想意识。而评点之学起源较晚,盛极于明代,又广泛流行,属于后起的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四库馆臣出于建设雅正文化的需要,所以对大量具体评点著作的态度,基本是批评或者蔑视的”^{[17]11}。

三、《四库全书总目》对清前期《左传》评点学立场及成因

清前期《左传》评点学自金圣叹评点《左传》开始为标志,经过被公认为是最佳古文选本的《古文观止》、《左传》评点史上具有“法”的里程碑著作《左绣》、桐城派开创者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等代表性的《左传》评点著作,终于达到全盛期。然而,尽管清前期的《左传》评点有《天下才子必读书》、《古文观止》、《左绣》、《左传义法举要》等影响深远的著作,且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宿将们也继承了《左传》评点之成就^③,然而,《四库全书》却尽删《左传》评点^④。综观《四库全书总目》,清前期《左传》评点代表作如《左传评》、《左绣》等均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天下才子必读书》、《古文观止》、《左传义法举要》等更未

①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他在评选科举考试的时文中发挥了儒家传统的“夷夏之防”的思想。其借“夷夏之防”阐释民族大义,表现出反抗清朝异族统治的一面。后在雍正年间被锉尸枭示,子孙及学生等也广受株连。

②乾隆修《四库全书》一方面是文化盛事,一方面却基于焚书坑儒。有资料表明,“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清政府销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块以上”。(参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编纂《四库全书》对中国古代典籍损失之大、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影响之深,是值得研究的。

③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左传》评点、《古文观止》、《左绣》等,已真正意义上使《左传》的经义成为文学评点的文本,而方苞及其开创的桐城派更将《左传》评点作为古文创作的内在原则并使其成为有清一代文学的主流样式。方苞及其桐城派认为作文法式传承为“左传——史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归有光——方苞”。尊《左传》为文章鼻祖,并认为《左传》文法源远流长、泽被后学。方苞本人《左传义法举要》、《方氏左传评点》等《左传》学评点著作始终坚持以“义法”贯之,后桐城派健将的著名《左传》评点学代表作如李文渊《左传评》、姜炳璋《读左补义》、刘大魁《评点左传》、姚鼐《评点左传》等,都承继着清前期《左传》评点所建立的“法”的美学特征,使清前期《左传》评点学达到全盛期。

④综观《四库全书》,仅徐乾学奉康熙帝敕编《古文渊鉴》中的《左传》评点列入《四库全书》,但其中圈点也被删去。

见著入^⑤。

清前期《左传》评点在乾隆朝盛极而衰,其与清政府变臆解为征实的文化政策^⑥息息相关。明朝的灭亡特别是南明王朝灭亡之迅速,使得清初儒者深刻分析其灭亡教训,并多归于王学末流之空谈心性。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痛斥清谈空疏之祸端:“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18]538}清谈之流祸确实令人震腕,而“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的现实,必然使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强调征实、推崇汉学。

清政府变臆解为征实的文化政策具体表现为经学研究被强调和推崇,汉学风气逐渐受到包容和鼓励,与之相应的即是乾嘉学派的兴起。清乾隆时期乾嘉学派的兴起实离不开清初三大家之一顾炎武的开创之功。梁启超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指出:“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19]60}。当代学者在研究清初学术思想及文学批评自乾嘉学派走向征实考据之转变的时候,也多认为其发端于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儒者。代表的如罗军凤先生即认为“顾氏的影响发生在乾嘉时期,乾嘉汉学以顾炎武为开派始祖,顾炎武‘读经必从审音始,说经必从考文始’的训导,在乾嘉汉学全盛时期,被学者恪守并发扬光大”^{[9]136}。

乾嘉学派变臆解评点为征实考据,一方面离不开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儒者的开创之功,一

方面则更需关注乾嘉学派的标志人物戴震。清政府可以以方苞散文为清代散文文学样式的代表,然而对其《左传》评点在根本上却是贬斥的。这说明清王朝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当文与道发生冲突时,始终是以道为根本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以姚鼐与戴震之分歧作为观测点。事实上,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与乾嘉学派标志人物戴震的分歧即预示了清乾隆时期学术研究及文学批评思潮的新走向。章太炎先生在论清初学术思潮历史走向时指出:“初,大湖之滨,苏、常、松江、大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恣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猷,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饰。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破。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章益分”^{[19]151}。章太炎先生精辟地指出:“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20]戴震与桐城派代表的治学理念发生根本冲突,“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饰。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破”,但《四库全书》总裁于敏中、总纂官纪昀、总纂官陆锡熊等皆支持戴氏之学,可以想见桐城派在汉学大本营中的艰难处境。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19]23}。《四库全书总目》对清前期《左传》评点学之立场及态度由此立见。

⑤《四库全书总目》对评点《左传》类著作总的态度是“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参(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0页。

⑥乾隆帝即位以后,即不断调整官方的文化政策,主要包括“公开倡导经史实学”、“征用经学之士”、“征书、编书”、“改革科举程式”。参刘奕《清代中期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22至23页。

可以说,“当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39年)戴震入四库馆修书,标志着《左传》古学复兴”^{[12]20}。而《左传》古学复兴是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相对立的。“《左传》经学的全盛阶段,也即乾嘉汉学治学风气之下,古学大兴之时《左传》经学研究的全盛阶段”^{[12]20}，“清代《左传》评点学与《左传》经学长伴始终,贯串整个清代学术史,评点学的兴盛与经学的兴盛适成反比”^{[12]328}。

四、结 语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昭示了清代学术精神、文学批评的新转折,自《四库全书总目》后,乾嘉学派终于成为清乾隆时期学术发展之主流。“《总目》编纂的实际操作先是由四库馆臣集体完

成的,最后由纪昀总其成,但是无论是纪昀也好,其他四库馆臣也好,其编纂工作是在某种思想指导下统一操作的。这种思想就是当时最高统治者即乾隆皇帝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的综合体”^{[3]131}。

客观地说,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完成可谓《左传》文学评点由盛转衰的历史标志,实可做为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全盛期的终结点。考察《四库全书总目》编纂之历史原因以及其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思潮之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认识《四库全书总目》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价值,而且可以进一步推动《左传》评点学史乃至《左传》学史的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李卫军.《左传》评点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 [2]郭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经》批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75-77.
- [3]吴承学.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J].文学评论,1998(6):131-134.
- [4]戴维.春秋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 [5]库勒纳.日讲春秋解义[M].清乾隆二年武英殿刻本.
- [6]王揆.钦定春秋传说汇纂[M].清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 [7]刘宗棠.清代《左传》文献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
- [8]徐乾学.古文渊鉴[M].康熙四十九年内府刻四色套印本.
- [9]罗军凤.顾炎武与清初《春秋》经学[J].清史研究,2011(1):132-136.
- [10]傅恒.御纂春秋直解[M].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 [11]王伟.《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12]罗军凤.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13]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4]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5]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16]龚鹏程.六经皆文:经学史/文学史[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8.
- [17]吴承学.《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J].文学评论,2007(1):5-11.
- [18]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 [20]章太炎.榘书详注[M].徐复,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